



近代人物

——专论与传记

◎ 徐松荣 著



银河出版社

近代人物

——专论与传记

徐松荣 著

银河出版社



书 名：近代人物——专论与传记

作 者：徐松荣

责任编辑：亦 黄

电子信箱：whgs 05@21cm. com

出 版：银河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龙中央邮局 73369 信箱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277 千

印 张：15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 - 962 - 475 - 689 - 0

定 价：人民币 36.00 元

导言——开篇的话

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既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亦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无论是世界近代，还是中国近代，都是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新的事件、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制度都在这个时代涌现，促成了人类社会的“转型、升级、换代”。这一历史进程被人们称之为“近代化”。

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纷繁复杂，尤其在中国近代。有的人物“向前看”，站在历史的潮头，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包括新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制度等多个方面），摇旗呐喊，击鼓前进，以新的思想、新的行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有的人物“向后看”，一切照“过去方针”办，照“祖宗成法”办，不能变，甚至要回到中世纪去。有的人物力求维持现状，认定现存的制度、现存的秩序是最美好的，既不主张回到古代去，也不主张变革。

转型时期的历史人物反复多变，呈现多样性、多面性。尤其是那些站在历史潮头、主张“变革”的先进人物、风流人物。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可又是转型时期的人物，不免受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的双重约束，表现为思想主张与实际行动上的多变、多样性。有的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却是“矮子”，有的是行动上的“巨人”，思想上却是“矮子”。有的主张“大变”、“急变”，有的主张“小变”、“渐变”，有的主张“变上”，有的主张“从上至下皆变”。有的今天主张“变”，鼓吹“变法”、“变革”、“革命”，明天又反对“变”，甚至全盘否定自身为了“变革”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有的主张“托古改制”，有的主张“仿洋变法”，或者二者兼行。有的要“救世”、“创世”，却又要“卫道”、“保教”，寻求“先师圣人”护身，或者饥不择食，把过时的宗教、神灵请来作“令箭”，驱使人们走向歧路。有的思想超前、言论超前，启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又脱离中国的传统与现实，阻力重重。有的是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一员，可又受危机的逼迫、现实的启发，成为社会、制度“革新”的领军人物。有的身处社会底

层，或发动起义，夺取半壁江山，称帝称王，或乘天下动乱之机崛起，成为某集团首领、一方人物，可又因自身腐败，内斗内耗，或在统治者、反抗者之间左右摇摆，反复无常而败亡。有的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甚至师徒，随着维新、革命运动的深化和演变，便转化为“政坛对手”，互不相容。这些近代人物，有的是官僚，又是改革家；有的是革命活动家，又是理论宣传家；有的是改革家，又是思想家、学者，还是实业家；有的是外交活动家，又是文化学者、诗文作家；有的是实业家，又是买办、侨领，等等。近代人物可谓复杂多样、形形色色、异彩纷呈。

本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涉及中国近代的政治史、军事史、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新闻报刊史、晚清改革史，以及山西、广东地方史。研究涉列的历史人物众多，达百人以上，其中的中国近代人物和广东近代人物各占一半，包括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实业家、外交活动家、文化学者、作家、报人，包括清朝重臣、将领，农民起义领袖，改革家、革命家、商人买办，以及江湖人物。除了已发表的个人专论、传记。在已经出版的多种人物传记丛书、人物传稿，以及通史、专门史著作中都作了研究和撰述。这些著作如：《清代人物传稿》、《捻军史稿》、《广东通史》（近代下册、现代上册）、《在粤近代名人与粤港澳关系》、《广东百科全书》新、旧版（近代人物）、《珠海历史名人》、《香港文化历史名人传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佛山》等，都撰写了大量近现代人物传记（以小传为主，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

这本《近代人物——专论与传记》，即是从以上已经发表、出版的论著中选辑20多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专论与传记结集成书。并将这些人物分为8个类型，即最期改革家、农民起义领袖、清朝重臣、维新改革家、革命活动家、清末改革官僚、文化学者、诗文作家、商人实业家。这样分类，有助于纲目分明，归类阅读，有助于认识和评判历史人物，有助于借鉴历史，总结经验。

本书以“专论”为主，集中反映某个人物的一个历史侧面，突出其正面，即某个方面的贡献、成就，或突出其反面、局限性，弥补以往近代人物研究在某个方面的缺失或片面性。因为不能展示其全貌，在每篇专论写了简短按语。要完整全面地评判该历史人物，还须阅读其他多种传记。其次为“传记”，也只是简篇或小传，对其一生作一个概括性述论。其生平与业绩的具体细节无法详述，并难以全面评价。该书对部分近代人物所作的述评，表达了作者的部分历史观、价值观，只是一家之言，希望与研究者同行共同探索，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目 录

导言——开篇的话·····	1
一、魏源与《海国图志》 ——兼论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1
二、评徐继畲的和、战思想与外交活动 兼评《瀛环志略》一书·····	10
三、洪秀全与天国兴亡·····	22
四、张乐行与捻军起义·····	32
五、略论李兆寿集团的崛起与覆灭·····	37
六、苗沛霖及其集团的兴亡述评·····	47
七、曾国藩与清朝的关系简论·····	62
八、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攻捻战略比较·····	67
九、论郭嵩焘抚粤与罢职·····	75
十、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开拓者·····	84
十一、郑观应在广东的活动及业绩·····	90
十二、维新改革的思想家、活动家与学者梁启超·····	106

十三、从草堂师徒到政坛对手

——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演变与根源····· 122

十四、孙中山家世源流再考究····· 137

十五、民主革命宣传家、报人陈少白····· 144

十六、从政又从文的叶恭绰····· 153

十七、民主革命活动家、报人、画家潘达微····· 160

十八、康有为的经学研究 with 教育思想简论····· 165

十九、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173

二十、略论黄世仲的小说创作、理论与艺术特色····· 177

二十一、论民元前的袁世凯····· 189

二十二、论戴鸿慈的宪政思想····· 199

二十三、实业兴邦的近代侨领张弼士····· 209

二十四、近代著名商人、买办莫仕扬

——附莫藻泉、莫干生····· 224

一、魏源与《海国图志》

——兼论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按语：魏源（1791—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参与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在两江地区筹办漕运、水利诸事。鸦片战争时参与浙东抗英斗争。战后编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围绕时政提出改革主张。另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等著作。其诗文后来辑成《魏源集》出版。本文即选取《海国图志》的一个侧面进行述评，反映其改革与开放思想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洋务新政的影响。本文除发表在《船山学刊》1995年第1期上，入编《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等多个论文集。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辑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理论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揭起“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早在8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过一场学术讨论，获得重大进展，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本文拟对《海国图志》的理论主张与洋务思潮的关系，再作初浅探讨。

—

鸦片战争的惨败，《南京条约》的耻辱，极大的震惊了国人。“天朝上国”败于“蛮夷小邦”，这一空前的变局，把一批有识之士推向开眼看世界，寻求“筹洋制敌”新对策的时代舞台。魏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所著《海国图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魏源面对“千古之变局”，毅然“以振国威，安边境为己任”^①，编纂《海国图志》，不仅向国人展示了一幅“海外桃源”，而且发出了非同凡响的时代最强音，“师夷长技”，学习西方。

魏源从介绍“夷情”入手，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进到要求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以富国强兵，其思想不断升华。面对顽固派的攻击，他

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认为“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礼宾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②。最后尖锐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③。

《海国图志》不仅提出和探讨了如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同时广泛介绍西方各国的史地沿革、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情不自禁地表达了作者对西方社会的仰慕憧憬，反映了他要求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思想主张。魏源以现实主义态度，承认“中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练兵之法”不如夷，“奇技巧器”不如夷，“务工勤商”不如夷，用人制度、政治制度不如夷。对于“夷之所长”，作了大量介绍和论述，概而言之，“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④。政治上，“律例合民意则设，否则废之”“选才识出众者，参议国政”^⑤。

魏源既看到“中不如夷”，更看到清王朝的衰败迹象，充满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于是“忧愤著书”，大声呼号“师夷”、“制夷”，“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懣，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⑥。认为只要发愤图强，“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⑦。并且坚信“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四海之民”^⑧。

“师夷”是为了“制夷”。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间形成一股“筹制夷之策”的思潮。魏源没有重蹈从古圣先贤那里寻求治国救国方案的老路，而是大胆地放眼世界，“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这是魏源的伟大之处，其主张“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⑨。洋务派正是魏源思想主张的继承者和实践者。

首先，洋务派倡导“师夷长技”以“自强”。李鸿章早在安庆营中就有所感触，萌发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念头。到上海后，更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⑩。他担心“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必积薪可危实甚”^⑪。奕訢、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楨、刘铭传、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都提出“师夷之长”以“自强”的各种主张。

其次，洋务派面对现实，承认“中不如西”、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冯桂芬分析说：“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⑫。王韬从“船坚炮利”、“工于贸易”、“制度精良”、“学有实际”、“政事简易”等方面论述了“西人之所长”^⑬。左宗棠正视现实，“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⑭。承认中、西方“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扶，我独无之。譬犹驶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

跨骏而我骑驴”^⑮。指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⑯。并迫切要求推行魏源的主张，大声疾呼：“策士之言曰；‘师其长以制之，是矣’！”“孰如浅见自封也”^⑰。李鸿章也认为：“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以夺其所恃”^⑱。

再次，洋务派强调“师夷长技”为“御夷之策”。面对古今未有之强敌，洋务派中的不少人重温《海国图志》，产生了共识。侍郎王茂荫向咸丰帝奏荐《海国图志》以筹划“抵制之术”。冯桂芬赞赏《海国图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倡导“采西学”，“制洋器”。奕訢与魏源也有一致的看法，“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⑲。曾国藩明确指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⑳，并首创安庆军械所。李鸿章一再强调“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㉑。以上“采西学”、“师夷智”、“师其所能”，是“师夷长技”的不同表述，洋务运动也就从这里开始。洋务派与魏源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在行动上产生共识，由“师夷长技”以“自强”，发展到“借法自强”，“变法自强”。洋务运动也就循着这条轨迹前进，酿成中国第一场近代化运动。

最后，初期洋务运动是在“师夷长技”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也没有超出魏源“师夷长技”的范围。洋务派的所谓洋务，就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使彼长技我皆有之”（曾国藩语）；“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奕訢语）；“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李鸿章语）；“师远人之长技，还以治之”，“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语）。洋务派与魏源有着共同的认识和主张，是近代社会思潮和时局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

《海国图志》所揭示的“攻夷”，“款夷”和“制夷”三者不可分，完整地反映了魏源的军事、外交思想，故梁启超称之为对外政策的“三大主义”。在《筹海篇》里，魏源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攻夷”、“款夷”、“制夷”三者的关系；“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榷”；“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之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又进一步指出：“未款之前，则宣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宣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奕訢、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对外战争和对外交涉中，运用和实践魏源的主张与方针，但不是成功的实践者，有成功，更多

的是失败，是误国。

“以夷攻夷”。这是鸦片战争时期有识之士倡导的“筹洋制敌”的策略方针。颜斯综认为“驭夷者必先得其情而后消其桀骜之气，折冲万里之外”^②。肖令裕提出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③。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正是运用这一策略原则孤立英国侵略者。

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及《圣武记》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策略思想。要达到“以夷攻夷”的目的，首先，必须“知夷情”，“知夷形”，知与不知，“利害相百焉”。其次，利用矛盾，联络和争取“外助”。在分析英国与其它国家的矛盾与利害关系后，提出联络各国两路（陆路、海路）进攻英国殖民地印度、新加坡的计划。再次，把外交斗争与学习西方结合起来，提出攻夷二策：“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认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④。还对战守原则作了系统阐述。

洋务派与魏源有相同的主张。薛福成提出利用英、法、俄、美4国的矛盾，“以各国牵制一国”，此乃“伐谋伐交之策”^⑤。推行这一策略方针的著名人物是李鸿章。他认为“外交之道与自固之谋相为表里”，“欲与洋人争衡”必经利用列强矛盾，推行牵制外交，使之“互相箝制而莫敢发”。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联合日本对付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尤其是对抗沙俄。甲午战后，昔日“联东方形势”，“以东制西”的方针失败，便转向“联俄拒日”，“以西制东”。还一度联络德国对付英俄，“师彼长技，助我军谋”^⑥。张之洞等人也有类似主张。左宗棠既坚持自强自立，也不放弃“以夷攻夷”的斗争策略。中法战争期间，认为德国“不似英之狡，法之傲，如能以息事安人之说动之，则仇既复，而仇亦解，宜可从也”^⑦。在进军新疆时，他利用“俄英构隙已久，俄恃其国大，英恃其兵强，各不相下”的形势，先平定阿古柏，后对付俄国，收复伊犁。

“以夷款夷”。进入近代，中外情势发生根本变化，“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⑧，“夷务”由传统的“攘夷之道”转化为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外交。“款夷”也就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魏源关于“款夷”的论述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悉夷情”。“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其次，注重“武备”。武备是外交斗争的后盾，“武备之振，不系乎夷之款与不款”^⑨。第三，推行“牵制”之策略。利用“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两相牵制”的情势，“款于可款之时”^⑩。第四，坚持“以我为主”，又借重“外助”，“联其所忌之国”，“合诸国以制一国”；争取第三国“调停讲款”，“收爪牙之助”。最后，挑选外交能手以“款夷”。“欲师夷技收

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③。

洋务派在对外交涉中，既继承、实践了上述原则，也有新的发展。但背弃了抗争精神，表现了软弱性和妥协性，造成严重的后果。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参与清政府外交活动的决策，期望以“信义笼络”，谋求“中外和好”，又采取“联吴讨魏”方针，开展外交斗争^④。李鸿章参与清政府一系列对外交涉和谈判，有抗争的一面，但大多数是妥协而误国。由于推行“和戎”，谋求“和局”的被动方针，不能制敌，反被敌制。但他又强调：“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⑤。也主张实力外交，对外“理势两不偏废”，“以宣威信”。左宗棠继承魏源的外交思想，坚持自强为本，“我真自强，彼已心折”，“心悦而服之矣”^⑥。他强调武备在外交谈判中的作用，“交邻之道，以实力为先”^⑦；“时时不忘战之念”，“在在不露战之形”^⑧。同时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纪泽尤其关注“夷情”，研究国际公法，并精于谈判艺术。在对俄改约谈判中，与左宗棠的实力外交相配合，获得成功。

“师夷制夷”是魏源的纲领性口号。怎样“师夷”？魏源主张：首在设厂局制造船舰、火器，聘请外国技师传授技术，“而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其次，“凡有益于民用者”，皆可制造，让沿海商民自行生产商船和民用器物，同时许民开矿。再次，学习外国“养兵练兵这法”，建立沿海水师和新式陆师。再其次，“立译馆”，“翻夷书”，介绍西方技艺，仿效西法，改革时弊。只有这样，才能“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⑨。

怎样“制夷”？魏源认为先要“悉夷情”，“知己知彼，可款可战”。次要“师长技”，“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⑩。三要增强武备，“使我无畏于彼，彼无可挟于我”^⑪。四要讲战守策略，“战于可战之时，守于可守之地”^⑫。五要革除人心积患，“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痍，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⑬。最后要“延天下人才”，强调“国以人兴”。魏源感慨地说：要制夷，“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已”^⑭。

洋务派对“师夷”、“制夷”，既发展了魏源的主张，也进行了大量实践。冯桂芬对“师夷”之说极表赞成，“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⑮。王韬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⑯。曾、左、李等人举办洋务实业，正是发扬和实践“师夷”的主张，把举办军事工业作为“第一要务”，以“夺洋人之所恃”。接着举办民用工业，“兴利求富”，“以利民用”。随后效法西方养兵练兵之法，建立新式陆军、海军，“为自强之本”。同时倡导“商战”，以“工商立国”，“与外人争利”^⑰。注重人才培养，“求贤才为急务”。从制器，练兵，

筹饷到用人，与魏源的主张是一致的，其目的也很明确，“谋所以抵制之”（曾国藩语），“与洋人争衡”（李鸿章语）。

“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制夷”，全面反映了魏源的“夷务”思想，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兴起。

三

从“师夷”到“洋务”，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必然结果。无论是魏源，还是洋务派，他们的思想主张都不断深化和发展，不仅是要求“师长技”，而且要求更全面、更深刻的变革。

魏源的变革思想，反映在《海国图志》和其它著作里。首先，提出“变局”论，反映出古今宇宙是一个庞大的变局，天、地、人、物无时不在“变”，各种制度无时不在“变”，而且“变则不可复”^{④5}。其次，坚持发展的历史观，倡导变法改革，论证“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④6}。只有“师夷”、“更法”，才能“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④7}。魏源的变革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进步。鸦片战争后，在时代风潮的推动下，又有新的发展。《海国图志》的主旨不是谈变法改革，但通过介绍“夷情”，畅谈世界大势，尤其是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沿革与政治风俗，通过论述“筹海”、“制夷”，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表达了他的变革思想。一是提出军事、外交变革主张，所论述的战、守、款，“攻夷”、“款夷”、“制夷”，即是集中体现。二是“师夷长技”，向西方寻求救国方案，是中国破天荒的变革。三是要求变外国长技为中国长技，是对“夷夏之防”观念的挑战和变革。四是要求变革科举，提出另设水师武科，对有贡献的科技人才给予科第出身。五是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六是追慕西方的民主政治，要求改革弊政。这些变革主张，对洋务派，对后来的维新派、革命派都产生很大影响。

洋务派通过举办洋务，掀起近代中国第一场变法改革，并形成较为系统的变革理论。“变”与“变计”，是他们首先提出的命题，“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不久，又正式提出“变法”的口号，“能自强则必先变法”。他们强调“变法”的迫切性。李鸿章指出“办洋务治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际”^{④8}。刘铭传与友人谈，若“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④9}。张之洞认为：“救时必自变法始”^{⑤0}。奕訢、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丁日昌等人也先后表达了他们“力师西法”，变革“祖宗成

法”的迫切要求，并转化为实际行动。从“师夷技”，“师夷智”，到“采西学”，“制洋器”，兴办实业；从建立新式学堂，到要求变革科举考试，“专设一科取士”，选拔“制器之人”和“经济匡世之才”^⑤；从倡导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到提出变革兵制、官制，要求政治改革。其政治改革主张，比魏源更明确，且前进了一大步。李鸿章提出“变法度先易官制”。郭嵩焘认为“议院”是“西方立国之本”，“实多可以取法”。张之洞说：“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固亦不嫌”^⑥。朱采、强汝洵、崔国因等人或私下议论，或公共奏请“设议院”。张树声临终遗折还陈请“设议院”，反映了他们要求政治改革的初步意愿。

洋务派的思想家、理论家，即早期维新派，更加激进地倡导“变法”。冯桂芬从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到“改科举”，“易官制”^⑦。王韬高唱“变法”，倡言“君民共主”^⑧。薛福成呼吁“变旧法”，推行“议会制度”^⑨。马建忠认为“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建学校、立议院才是“本”。^⑩汤震吁请朝廷“善变法”，“善用法”，并提出“设议院”的方案^⑪。郑观应系统阐述了洋务理论和变法思想，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制。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思想界逐步形成一股变法改革思潮，为戊戌维新变法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魏源“师夷长技”，倡导“更法”，洋务派“力师西法”，倡导“变法”，手段都是学习西方，目的也基本一致。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其要旨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同时“因其所长而用之”，富国强兵。洋务派主办洋务之初，带着“治内安外”，即“剿内寇”，“御外侮”的双重目的。但到后来，“安外较治内为尤急”^⑫，并逐步转到发展民族经济，“求富强”，“利民用”的轨道上来，面对“夷情猖獗”，奕訢认为“御外侮”乃“国家大计”，“探源之策在于自强”。曾国藩提出“师夷智”，在于“谋所以抵制之”。李鸿章主张“办洋务治洋兵”，一再重申“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既“与洋人争衡”，也“使我自强”。左宗棠指出办洋务在于“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举在乎此”；“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洋务派的理论家尤其强调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以“张国势”，“制西人”。

洋务派继承和发展魏源的改革思想，从“经世致用”到“西学为用”，从“内修政事”到“外采西学”，从“师夷长技”到“借法自强”，从练兵制器到广泛的社会改革。这是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变革思潮的发展轨迹。在指导思想，即“体用观”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一言以蔽之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无论是内涵与外延，“中体西用”是“师夷长技”的继承与发展，深化与扩张。魏源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变，“其不变者道而已”，于是提出“可变者势，不可变者道”^⑤。言下之意，西方的“长技”可以学，治理国家的法令、政策可以改，但中国的制度、伦常、名教不能变。洋务派的“体用观”承上启下，又有较大的突破，尤其是“西学”的范围与内涵大为扩展，不仅包括“长技”，还包括西艺、西学、西政等方面。洋务派人物作了如下表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本，西学治标”，但其实质一样。

“中体西用”观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这一过渡时期的产物。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传统思想仍然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充满了落后性与保守性。封建顽固势力凭借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仇恨、反对和阻挠改革。就这样，近代中国拖着沉重的铁镣走向世界，改革派戴着沉重的枷锁推行变革。“中体西用”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里产生的，也是与顽固派展开斗争的武器。同时，从魏源到曾、左、李，都是从封建儒学的书斋里走出来的，不可能摆脱“中学”的束缚，自然坚持“体”、“道”、“本”不能变。却又要学习西方，推行改革，于是“西学为用”的原则应时而生。“西学为用”与“中学为体”相结合，便构成包括魏源到洋务派的改革派的整体思想原则。但随着中国进一步卷入世界大潮，资产阶级维新与革命运动的先后兴起，“中体西用”观也就被否定和抛弃。

魏源《海国图志》的理论主张，对洋务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洋务派举办洋务实业，倡导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和实践魏源的理论主张，揭开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反映了历史的联系性和客观的必然性。

注释：

①陈澧：《东塾集》卷2，《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

②③④⑤⑧⑨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⑥⑦⑪⑫魏源：《海国图志序》。

⑩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⑬⑭⑮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卷19，《备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⑯《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

⑰⑱⑲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制洋器议》。

⑳王韬：《弢园尺牍》，《与周甫徵君》。

- ⑭⑮⑰⑰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一，页1；文集，卷一，页11；书牋，卷十七，页23；文集，卷二，页11。
- ⑱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页318。
- ⑲⑳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页13。
- ㉑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页14。
- ㉒颜思宗：《海防余论》，见《海国图志》，卷52。
- ㉓肖令裕：《粤东市舶论》，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九。
- ㉔魏源：《圣武记》，卷17，军政篇。
- ㉕薛福成：《庸庵文录外编》，卷3，《上曾侯相书》，《筹海防》。
- ㉖④⑨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洋务运动大事记，页388，页391。
- ㉗⑤⑤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 ③④④⑤④⑤⑤⑤《魏源集》、《道光洋船征抚记》，下，《默觚下·治篇十六》；《筹鹺篇》；《治篇五》。
- ③①《魏源诗文选注》，页308。
- ③②奕訢：《请设总理衙门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
- ③③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
- ③④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8，页324。
- ③⑤③⑥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6，页41，卷59；页70；书牋，卷26，页60。
- ③⑦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卷1，卷2，卷59。
- ③⑧《魏源集》，《道光洋船征抚记》，下，《默觚下·治篇十六》；《筹鹺篇》；《治篇五》。
- ③⑨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卷1。
- ④③王韬：《扶桑游记》。
- ④④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页13，（七）页484；（一），页232。
- ④⑤⑤②张之洞，《劝学篇》，《变法》；《会通》。
- ⑤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页41。
- ⑤④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
- ⑤⑥马建忠《适而斋纪言》，卷2。
- ⑤⑦汤震《危言》，《议院》；《变法》。

二、评徐继畲的和、战思想与外交活动

——兼评《瀛环志略》一书

按语：徐继畲（1795—1873年），字健男，号牧田，又号松龛，山西五台人。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历任地方官，从知府、布政使至广西、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同治年间入京为官，在总理衙门行走，又任京师同文馆大臣。著作有《瀛环志略》、《退密斋诗文集》等。本文除了重点评述徐继畲在鸦片战争时期的“和”、“战”思想，以及著作《瀛环志略》的开放改革思想，同时评述了某些历史事件，林则徐等人的历史局限、错误主张。本文入编《徐继畲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汇编》。

每个时代都有他的先进人物，是极少数，且仍然有时代的局限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进人物，没有不受时人的压制、打击，只是后来人才把他们捧上历史的神龛。为什么？因为千百年来，在中国这个保守的国度里，生活着保守的国民，做着保守的梦，读着保守的书，唱着保守的歌，习惯于向后看，向祖宗看齐，照祖宗说的去做；习惯于向内看，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四周都是夷狄蛮邦，只能朝贡，不能平起平坐，且不屑一顾；习惯于向上看，唯帝王是瞻，唯圣人是听，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罪该万死。

十九世纪初中期——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进入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处于十字路口，成为“古今一大变局”。^①这是由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际关系决定的。“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②从国内而言，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清朝统治危机四起，“更法”改革思潮应时而生。从国际而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外交、贸易、鸦片等手段力图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失败以后，开始以战争强行撞开中国大门。中西方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战争不可避免了。如何应对动荡时局、中外战争，一批开始醒悟的官僚士子，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畲为代表，形成经世派。本文重点探讨徐继畲在鸦片战争时期如何应对中外战争、处理中外关系的活动与思想，同时涉及林则徐等人物和其他事件。